

辛亥革命的挽歌

——鲁迅《哀范君三章》史实证析

段 炼

[提 要] 《哀范君三章》是鲁迅在辛亥革命之际所写下的感人诗篇。从对范爱农悲剧的思考，鲁迅开始了对新的救国道路的探索。立人、国民性、唤起民众……鲁迅投入了新的战斗。《哀范君三章》不仅是缅怀范爱农的悼诗，更是辛亥革命的一曲挽歌。

[关键词] 鲁迅 范爱农 挽歌

《哀范君三章》是鲁迅于 1912 年 7 月 22 日夜在闻知友人范爱农溺水而逝的消息后写下的悼亡诗篇。最初以“黄棘”的笔名发表于 1912 年 8 月 21 日绍兴《民兴日报》上。

辛亥革命这场 20 世纪初席卷中国大地的风暴与鲁迅有着不解之缘，他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 Q 正传》、《药》、《头发的故事》、《风波》等大都以辛亥前后的东南社会为背景，以辛亥革命为题材。在这些小说中鲁迅剖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但是这些作品都是在鲁迅经历了革命的失败，经过一段时期深刻的反思而得出的结论。^①辛亥前后鲁迅所留下的文字并不多，事涉辛亥革命的更属凤毛麟角。^②因此《哀范君三章》为我们了解当时鲁迅的真实思想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本文仅就《哀范君三章》的有关史实试图作一些浅显的证析。

一

1912 年，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依然强大的封建反动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略为喘息之后如同天边反扑而来的乌云时时刻刻威胁着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代表着封建复辟势力的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时间满清旧臣占据了中央政府，重建封建帝制的阴谋正在暗中秘密酝酿。

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时局的发展。混乱的局势提供了列强进一步掠夺中国资源和财富的有利时机。1912 年 5 月，英国武装入侵西藏；6 月，沙俄铁骑踏开新疆大门；日本、德国又接踵而至……在内外交困之中，辛亥革命所带给中国的希望之光又迅速地暗淡了下去。

1911 年 11 月 5 日，杭州光复。绍兴官府惶恐万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③密谋着对策。11 月 6 日，绍兴宣布独立。第二

^① 有中国近代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之称的《狂人日记》写于 1918 年 4 月，离辛亥武昌首义也有近七年之久。

^② 鲁迅辛亥时期涉及革命的文章今仅见文言短篇小说《怀旧》、短文《〈越铎〉出世辞》、诗歌《哀范君三章》，及《军界痛言》等佚文。

^③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见《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第 1 版。

天，即11月7日，范爱农就兴高采烈地拉着鲁迅“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①“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②当时，武昌首义之后各地所建立的革命政权大多被立宪派所篡夺，如原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即旅长）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曾赞成杀害鉴湖女侠秋瑾的旧官僚、立宪预备会的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省都督；而绍兴在独立之后原绍兴知府程赞清则摇身一变成了绍兴军政分府府长，曾力主“平毁秋墓”后隐匿于绍兴的原浙江巡抚衙门刑名师爷章介眉出任军政分府治安科长，“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③都开始“咸于维新”了。

当然，民国肇始总还是要有一些新气象的。11月，鲁迅和范爱农的老相识、革命党人王金发率领着数百名革命军在民众一片“革命胜利”、“中国万岁”的欢呼声中进了绍兴城。进城伊始，王金发立即改组了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分府，自任都督，逮捕了章介眉。^④继而又宣布免除一年钱粮、崇平价米等与民生息的政策，颁发安民通告十则。同时，王金发还接见了鲁迅、范爱农等一批旧日的朋友。作为新政之一，王金发任命鲁迅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并给予校款二百元。鲁迅又介绍范爱农出任学堂学监一职。但好景不长，“绿林大学出身”的王金发刚进城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⑤

不久，越社负责人、以前的学生宋紫佩来拜访鲁迅，提出办一份报纸来监督绍兴军政分府，希望发起人能借重鲁迅、陈子英、孙德清等人的名字。鉴于王金发等革命党人的兑变，鲁迅答应了这个请求，并建议报纸命名为《越铎日报》。铎，原指大铜铃，后泛指警钟。鲁迅希望新办的报纸能使王金发等人警醒。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第一期出版。在创刊号上鲁迅以“黄棘”的笔名发表了《〈越铎〉出世辞》一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辛亥革命：“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⑥但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再一次使鲁迅看清了这场革命的本质。

对于这份“开首就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⑦的《越铎日报》，王金发渐渐有了怒意。他不仅送了五百元钱贿赂报馆，甚至传言要用手枪打死鲁迅等人。1912年3月，《越铎日报》馆终于被一群士兵捣毁，报刊发起人之一孙德清的大腿上还挨了一枪刺。^⑧与此同时，鲁迅因批评报社某些人员接受王金发的贿赂而与他们发生分歧。此时山会师范学堂的经费也因王金发的“怒意”而断了来源。这些情形促使鲁迅决意离开故乡绍兴。

这时正值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部总长。时在部中工作的许寿裳向蔡元培极力举荐鲁迅，于是蔡元培便托许寿裳延聘鲁迅来教育部工作。对于鲁迅赴南京教育部任职，范爱农也很赞成，但感于老友远离还是觉得颇为凄凉，说：“这里又是这样，住不得。你快去罢……。”^⑨

二

^{①②③④⑤}鲁迅：《范爱农》，见《朝华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版。

^④章介眉被捕后当即以“毁家纾难”的名义，“捐献”了若干财产，获得保释。脱身之后，章介眉赴北京任袁世凯政府财政咨议、财政部秘书等职，并投书内政部控告王金发，要求发还充公的财产。参见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⑥鲁迅：《〈越铎〉出世辞》，见《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版。

^⑨参见鲁迅：《范爱农》。

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蒿农。浙江绍兴皇甫庄人，1883年4月9日（清光绪九年三月初三）诞生在一个破落的幕僚家庭中。范爱农3岁丧父，5岁丧母，与妹妹范云姑靠祖母抚养成人。范爱农在浙江绍兴府学堂求学期间，徐锡麟任该校副办（副校长），兼算学、测绘、体操教习。在徐锡麟的教诲下，范爱农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是绍兴府学堂的高才生，也是徐锡麟的得意门生之一。

1905年冬，范爱农随徐锡麟夫妇及陈伯平、马宗汉等人赴日本留学。当时正在日本学习的鲁迅曾应陈子英之约前往横滨迎接，就在这时开始与范爱农相识。见面之际，由于一些琐碎的小事，鲁迅与范爱农之间产生了误会。^①

1907年，徐锡麟、秋瑾等人因起义失败而惨遭满清政府杀害。消息传到日本，群情激奋。留日学生秘密开会，决定派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日籍人士前往绍兴去接徐锡麟的眷属来日。同时举行集会，悼念徐锡麟、秋瑾诸先烈，谴责满清政府的暴行。在会上，鲁迅等人提议“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②但是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范爱农的反对。鲁迅“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③“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认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④可见当时争执是很激烈的。其实两人之间的分歧主要还是由于误会而造成的，范爱农的冷漠自有他难言的苦衷。就在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烈士在绍兴殉难的那一天，两江总督端方给满清政府驻日使臣杨枢发了一份密电，全文如下：

东京，清国使署杨大臣鉴：瀛，逆匪徐锡麟之弟徐伟供称，同党沈钧业，号馥孙，浙绍人，系早稻田学生，现寓牛区东乡方家；又会稽人范肇基，号爱农，在物理学校，均有通逆谋乱确据。祈随时密察两生举动，不论其何时回国，先期电知，以便设法密拿。切勿稍露痕迹，为要。方。鱼。^⑤

范爱农既是被满清政府“暗察举动”并“设法密拿”的“逆匪同党”，他的一言一行必须更为谨慎小心。况且在他看来，向残暴的满清政府发什么通电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杀的杀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⑥这当然是范爱农在悲愤之际所说的偏激之辞。

后来，范爱农因祖母病故不得不回到绍兴老家。虽然满清政府没有对范爱农施以毒手，但终因他是徐锡麟的得意门生，又是“有通逆谋乱确据”的“逆匪同党”，故“受着轻蔑，排挤，迫害，几乎无地可容”。^⑦1910年夏，范爱农因不愿与有谋害秋瑾烈士之嫌的代理监督杜海生共事，辞去绍兴府中学堂舍监一职。是年8月15日，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写道：“前校长蒋姓，去如脱兔，海生检其文件，则凡关于教育者，竟无片楮，即时间表亦复无有，君试思天下有如此学校不？仆意此必范蒿农所毁以窘来者耳。斯人状如地总能如是也。”^⑧离开学堂之后，范爱农只好回到皇甫庄“躲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①

1910年8月，鲁迅应邀回到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兼博物教员。这一年，他与范爱农又见面了。自此，范爱农每次进城必定拜访鲁迅。通过进一步的了解，以前的误会尽释，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绍兴光复之后，鲁迅介绍范爱农出任山会师范初级学堂监学，共同从事革命运动。但

^① 参见鲁迅：《范爱农》。

^{②③④⑤⑥⑦} 鲁迅：《范爱农》，见《朝华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版。

^⑧ 见《辛亥革命》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53—154页。

^① 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版，第5页。

是王金发所领导的绍兴军政分府让鲁迅、范爱农甚感失望。1912年3月在鲁迅离绍赴宁任职后不久，范爱农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由于此信反映了当时绍兴的政治环境和范爱农的坚强性格，兹抄录如下：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承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美煞美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廿七号。《越铎》事变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②

此后不久，范爱农被山会师范学堂新任监督、绍兴孔学会会长傅励臣及该校职员、绍兴自由党头目何几仲等人排挤出学校。一时之间范爱农和他的妻儿衣食无着，只好寄食于旧日留学日本时的同学、时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司长沈复生（即前文《端方密电》中所提及的沈均业）杭州的家中。仅1912年5月短短的一个月中，范爱农即给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这时教育部已迁往北京）写了三封信，信中所述颇为凄凉。^③然而鲁迅刚刚任职教育部，自身尚未安顿，一时爱莫能助。后来，鲁迅曾遗憾地回忆道：“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④

1912年7月10日，在政治上、经济上饱受打击的范爱农在绍兴皋平附近的河中不幸溺水身亡。^⑤“如此世界”，“惟死而已，端无生理”，范爱农是被封建反动势力迫害死的。他的死是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控诉和批判！消息传到北京，鲁迅为之沉痛不已，“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⑥在7月22日这一风雨之夜，鲁迅挥笔写下了《哀范君三章》。

三

《哀范君三章》是鲁迅满怀深情所创作的三首旧体诗，诗中不仅寄托了对友人无尽的哀思，也饱含着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反省。

第一首诗，鲁迅以辛亥革命为时代背景，从中刻画了范爱农蔑视反动势力，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风雨飘摇日”，诗歌从一开始就点明了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时局动荡不安，人民颠沛流离。作为革命者的范爱农有感于此，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的。“颠”在这里指头顶，“华”通“花”，“寥落”为稀少的意思。此时的范爱农虽处于青壮之年，但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头上却有了白头发了”。^⑦原先的范爱农是“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渺视”，^⑧对于那些“鸡

^② 此信尚存，参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增订版，第259页。全文转引自周作人：《关于范爱农》，见《药味集》。

^③ 参见《鲁迅日记》1912年5月15日、5月19日、6月4日。

^④ 鲁迅：《范爱农》，见《朝华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版。

^⑤ 关于范爱农的死，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写道：“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范爱农的家属则认为肯定是被人所害。至今这仍是个谜。

^⑥ 见《鲁迅日记》1912年7月19日。

^{⑦⑧⑨⑩⑪} 鲁迅：《范爱农》，见《朝华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版。

虫”小人往往报以“白眼”。相传西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善作“青白眼”，每见“礼俗之人”即“以白眼对之”。^①在这里鲁迅以“鸡虫”谐音“几仲”，有力地讽刺了绍兴自由党头目何几仲之流。^②“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然而世态炎凉，辛亥革命的斗士范爱农在革命胜利之后却尝尽了“世味”之苦，苦得就象秋天的老菜（即“秋荼”）。在所谓的“人间”，由于“直道”的“傲骨”，范爱农时时碰壁，就象在给鲁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在诗中，鲁迅对范爱农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黑暗的现实进行了控诉。1912年4月中旬，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回过一次绍兴，5月初离绍赴北京任职。不料才离别仅仅三个月，“竟尔”就失去了这样一位不同凡俗的朋友。诗中的“畸躬”即畸人，意指不从流俗较为独特之人。孔子尝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③“畸躬”一词突出了范爱农“未能随波逐流”的独特个性。

第二首诗，鲁迅以简练的诗句概括了范爱农的一生。

首句“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说的是范爱农青年时代曾在日本留学，多年未能回国。在此，鲁迅追忆了这段往事。范爱农幼年失去双亲，家境并不富裕，但他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自费来到日本求学。在这期间，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可以说日本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满清政府被推翻。然而“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代表封建反动势力的袁世凯却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此诗在编入《集外集》时，鲁迅重新写了这一联：“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在二十年后鲁迅重写的这一联，其主题内容与“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完全吻合。漫漫长夜无尽时，旧宫新主自在春。显然，鲁迅“在那时已经看出了袁世凯要玩把戏了”。^④“桃偶”“登场”之后的社会黑暗现实正是范爱农之死的根源。“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鲁迅进一步刻画了范爱农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感于革命未能成功而无比悲愤的忧国忧民之情。鲁迅疑心范爱农是自杀的，但那清冷的河水怎能涤尽心中无穷的愤懑和怅惘？鲁迅虽然尊重和怜惜范爱农这位革命战友，但对于他性格软弱的一面却毫不隐讳。鲁迅向来提倡那种与反动恶势力进行韧战的毅力，对于以死抗争并不赞同。

第三首诗，鲁迅通过对范爱农往事的追忆和缅怀，表达了自己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迫切心情。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范爱农爱喝酒，因此常和鲁迅一起喝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⑤其实“疯话”不疯，而是纵谈天下时势的言论。可见范爱农之所以爱喝酒是在受封建反动势力排挤、压迫后的借酒消愁，并借酒兴来“论当世”。范爱农虽然爱喝酒，但并不是嗜酒如命的高阳酒徒。“小”在这里用作动词，含有小看、蔑视的意思。对于那些一味滥饮、糊里糊涂的酒徒范爱农是看不起的。绍兴光复之际，范爱农从乡下来到城中，对鲁迅说：“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⑥这时，他脸上“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⑦在担任监学之后，范爱农“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⑧“大圜犹茗，微醉自沉沦”。鲁迅的笔锋一转，又写到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昏乱迷醉。这时鲁迅的思想已经触及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没有真正唤醒民众。革命为酩酊的民众所不理解，真正的革命志士又为黑暗的社会现实所不容。相比而言范爱农较之普通的国民要清醒多了，在

^① 参见《晋书·阮籍传》。

^② 在绍兴，自由党往往被讹称为“柿油党”，亦为谐音。

^③ 参见《庄子·大宗师》。

^④ 许寿裳：《怀旧》，见《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6页。

这昏昏噩噩的国度或许只能算是“微醉”吧！另外，据当事者回忆，范爱农在溺水之前也确实喝了一点酒。实笔虚写，鲁迅其中自有深意。范爱农死了，“从兹绝绪言”，再也听不到他纵论当世的“疯话”了。随后鲁迅又想到了其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处境和范爱农大同小异，如今也早已如“云散尽”。看来范爱农的悲剧在当时并不是孤例，而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正是在范爱农的身上鲁迅看到了那一代处于彷徨、苦闷中的知识分子的身影。

《哀范君三章》是鲁迅在辛亥革命之际所写下的感人诗篇。诗中不仅有对故友范爱农的深切缅怀，更饱含着一个革命思想家对辛亥革命这场二十世纪初中国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深刻反思。

鲁迅认为革命只能是“立人”的手段之一，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手段只有服从于目的才具有合法性。鲁迅冀望着—场中国从未有过的革命，它能带来人的解放。鲁迅希望通过政治革命掀翻人肉宴席，而不是为了掀翻旧桌子又摆上一张新桌子，或者只是调整—下享用这宴席的食客的座次。因此，鲁迅决不一般地支持或否定革命。革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否能推动人的解放而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政治革命是为“立人”的目的而服务的，道德革命、经济革命、妇女解放……—切的革命都是如此。

从对范爱农悲剧的思考鲁迅开始了对新的救国道路的不懈探索。立人、国民性、唤起民众……—些课题摆在了鲁迅的面前。“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鲁迅最终确认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拿起笔投入了新的战斗。

没有经历过辛亥革命这场风云，没有范爱农的悲剧，是不会有诸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头发的故事》、《风波》等脍炙人口的名作的，辛亥革命给鲁迅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因此，《哀范君三章》不仅仅是缅怀范爱农的悼诗，更是献奉于广大国民面前的一曲辛亥革命的挽歌。

^①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版。